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

编者：王　斑　钟雪萍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 / 王斑，钟雪萍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5-04713-9

Ⅰ.美… Ⅱ.①王…②钟… Ⅲ.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982 **号**

丛 书 名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书　　名 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
编　　者 王　斑　钟雪萍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9.25　**字数** 161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713-9 / D·517
定　　价 18.5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言：王　斑、钟雪萍 / 改写出国留学的“成长小说” …… 1

陈小眉 / 又是红枫时节 …… 1
——写在旅美教学十八年之后

李海燕 / 书与剑：课堂中的中国与美国 …… 19

刘剑梅 / 我在美国的教学生涯 …… 29

孟　悦 / “中国结” …… 39

王　斑 / 全球化、地缘政治与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形象 …… 47

王玲珍 / 剥洋葱：在美国教现代中国性别及女性文学 …… 62

王晴佳 /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
——美国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缘起和现状探究 …… 72

杨国斌 / 历史对于社会科学的启示：
在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教中国课程 …… 95

叶维丽 / 历史课堂杂记 …… 104

乐　钢 / 哈哈镜中的叠影：我的美国学生 …… 113

钟雪萍 / 一份她者的差事：我在美国教中国 …… 123

前　言

在当今世界大开放的新格局中，“全球化”这个名词不啻是经济、社会范畴内的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发展的需要。表现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领域的“全球化”，则呈现为东西方文化的互渗互动、融会贯通，即以全新的学术视野，“打通”的学术眼光，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渗透、比较研究中抽绎出中西学术的核心价值，并在学术规范、方式方法上衡之一种共通的学术标准，使学术研究不再围囿于“象牙塔”，或是圈子内激赏把玩的“妙品”，而应该使学术研究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普世”的学术价值。

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走在了前列。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了基础的中国文化教育，后又留学欧美，并在欧美著名大学内从事文化教育与研究工作。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他们并没有迷失自我。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吸收西方的文化涵养，一方面他们一样倾情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利用熟谙两种语言的学科背景优势，“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从事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们有时就像一群学术研究的“候鸟”，穿梭往返两大洲之间，利用他们的学术假期和会议时间与国内同行作广泛的学术交流，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创见的学术成果。而这正是我们出版这套“海外华人学者论丛”的缘由。

本论丛收集的大都是这些海外学者近几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题材多样，研究形式不拘一格。他们有的文章已在国内外发表出版过，有的则首次在国内出版。我们从审读中觉得，他们的学术视野广阔，学术架构清晰，研究问题敏锐，研究思路富有前瞻性，有些提出了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尤其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术规范的精准操作上，给国内的学术界吹来了一缕清风，我们希望这一缕清风能吹皱起国内学术界的一片涟漪。

学术无国界。在这个存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我们突破这种“霸权”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彰显我们东方的学术价值，以撇清西方大众对我们文化认知与解读上的种种误区。我们需要更多的李约瑟、费正清、杜维明、余英时们，我们需要一批东方学术的“传道者”。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些海外学者们提供一个学术出版的平台，我们乐于充当这样的文化支撑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 月 2 日

序言

改写出国留学的“成长小说”

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越来越多人梦想到西欧北美的大学里留学。在人们的想象中，西方高等学府钟楼高耸，庭院深深，草坪碧绿，俨然学术殿堂。教授和学生的举止言谈富有神圣的宗教气息。求学态度严肃，人际交往生动活泼，不乏浪漫情调。西方高等学府被想象成世俗的、人文的、理性的、启蒙的现代宗教圣地。这里的知识是普世的，属于全人类的；立场观点是超越的，全球化的。不管你是什么人种，来自什么国家，身后有什么历史记忆，血管里是什么血缘，到了这学术大雅之堂，就可以将历史包袱弃之门外。你的皮肤也可能会变白，英语会染上美国腔或牛津腔。你将通过这个无香无臭、透明的世界语言，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和理性。这是展望未来的个人成长小说的梦境和动因。随着国门打开，改革开放，这篇个人成长小说的情节走向越来越明确。主人公从愚昧封建的人格中脱身，从褊狭落后的黄土地离家出走，奔向蔚蓝，漂洋过海到彼岸留学。进入西域学府，便学会口操“世界语”（其实是英语），与绅士淑女、知书达理的文明人共同交流探讨，对着金樽美酒高谈阔论，共度学术和道德大同的良辰美景。

在出国前，这部文集中的作者们多少打过这样天真烂漫的腹稿。到美国留学后，亲身体验此地学术文化，发现这个原来想象中的乐园其实是个海市蜃楼，掩盖的却是与文明孪生的愚昧和纷争。他们开始改写、质疑玄想了多遍的、关乎道德文章升华的长大成人小说。作者们大都是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毕业后从事所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早在当学生时期或初到美国之际，作者们就发现，貌似公允、真理的学术中，其实处处绵里藏针、笑里藏刀，学术殿堂可以闻到火药味。世界之大，多元文化平等公理之鼓噪，其实难以容下一张原先想象中那样的宁静书桌。面对学术巨人的雄文巨制，沉浸于丰厚的欧美文化遗产，参与专家聚首的国际研讨会，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却每每觉得像是在继续过去的斗争哲学。在多民族、杂文化的气氛中，压迫、不平、反抗、翻身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留学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不远万里到文明“升平”的西域，原是为追求知识之充实、道德文章之完善，然而却不由自主地

陷入多元文化的剑拔弩张的纠纷中。作学生时，发言表态仍有试探性，在学习进修过程中，可以放过，无需定论，所以并没有太强的纠缠难耐的感觉。等到你当了教授学者，要著书立说，成一家言，引导学生，并陷入学院里的学阀政治、学术纠纷时，不想被纠缠也势必要陷入意识形态的争端之中。

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历史，原来以为可以从美国学院的净土，平心远距离观察中国，以期识别庐山真面目。其实不然。世代积存的西方主义的居高临下，永远以道德优越俯察中国的缺陷和丑恶。冷战遗留下的心态，将西方与东方看成水火不容的两个世界。我们光明，他们黑暗；我们民主，他们专制；我们先进，他们落后。全球化的雾障将昔日冷战的敌手幻化为未来的十里洋场：冒险家们在云里雾里瞥见庐山上崛起的经济高楼，期待成为黄金地带的房地产主人。军机财团大员却日益忧患庐山之威胁，但觉那丛林之中、长江之滨，正在聚集一群敌视抗拒现代化、全球化的盲流草寇，正在形成新的革命根据地，抵御现代文明帝国的围剿。冷战心态常常与基督教救世主姿态相结合，每每觉得中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白人救世主来拯救。这些普渡众生的白人都是白马王子，得救者一般不是男生，更多的是受欺凌、让人怜惜的东方佳丽。在课堂或讲座中提及中国人的自主性，自力更生的建国努力，十之八九会遭到这样的质疑：那么那些被压迫的妇女呢？似乎不谈被压迫的妇女，就肯定是在为中国政府抹粉。追求自由，赐予自由，在美国的“中国学”中处处可见，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经常是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代性，总之中国上下古今之不自由，最后的解决只有以自由为武器来攻克庐山，然后把庐山盛景改造成为“帝国的后花园”。所有这些心态都显示出，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没有纯而又纯的空间，没有普世的、公允的审美。我们每天都要和各种成见、歪曲斗，和道德优越感、自卑感斗。

在美国教中国文化，说来也是在从事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大同的盛事美事。文化交流应导致全球之道德完善，促进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和平共存。作者们在改写个人成长小说时，发现理想的叙述中处处有国家民族、东方西方、穷人富人，北方南方之间的权力、路线甚至军事斗争。这种对时势的发现也许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使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理想的纯真和超前，但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没有互相理解，没有世界各国平等大同的诉求，文化永远是政治和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地球无宁日。学院里仍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本文集的成编，来自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国际环境、具体的学术氛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奔向蔚蓝、留学西域的长大成人小说，也许很多人还在继

续编撰，已经有了很多续集。这部文集中的言论和体验，希望能给仍在编撰成长小说的作者们一些改写的机会、质疑的瞬间。文集的编者和作者全都来自中国大陆，作为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的学者在美国生活了十几至二十年不等。对中国和美国社会的观察、认知和了解，可以说是亲历的、实地的，是从战壕里得出的体验。基于这种体验，他们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及其文化逻辑作进一步认识和思考。

作者们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到美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教书。由于平时埋头研究和教学，忙于谱写天天向上的学术履历，很少静心反思这一过程中的经历，更少有余裕通过自述的散文文字来传达。所思所想、切肤之感，主要在学术性的文字中得以“理性”的表达。不过，尽管平时并不多考虑自己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什么变化，但有时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在美国似乎身份不清：是“中国人”？“华人”？“一夜美国人”？华侨、旅居海外华人？“美籍华人”？作者们在中国则一般被界定为“旅美（华人）学者”。也许，在上述民族国家、东方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对峙、普世平等的语境内，身份的飘移不定可能是启蒙和发扬理性最为有力的位置。作为在大学教书的学者，我们所拥有的“特产”之一就是多年来这种游移不定的身份。这是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所取得的经验和由此而引起的思考。文集中文章，体现了一种思想和批判的游击战术。作者们在深入讨论教学和研究的方方面面时，不囿于文化上的夷夏之分、中西之间的界限、文化本质论的泾渭。解释和理解文本和社会，放弃阵地战，不搞两军对垒，显示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灵活机动。因此，探讨和发挥这个多重身份，这种思想的游击战术，也许会使留洋成长小说的情节枝节横生，让小说里的人物身份、性格变化富于转机。

我们可以稍微看看“旅美”到底有什么机动性、灵活性。“旅美”似乎是个中性稍带褒义的词，一方面包含着对美国的某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另一方面意味着接近更为优越高尚的文明，是某种让人羡慕的地位。这里含有当代中国人对美国文化和国威的仰慕，并夹杂着酸葡萄的轻蔑。但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职业习惯和我们的游离身份有利于追究并打破那些僵化的观点、概念和想象。

如果说“旅美”指的是出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年后到美国定居的人的话，那么，我们都属于这一范畴。但这一范畴中各种人群的经历、经验和体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实际上不尽相同。单就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来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旅美”人群来看，大致可根据出国前在中国的背景、出国的途径、出国后的经历和选择看出人群的分流，其中当然还包括各种各样无

法计量的偶然因素。“旅美”一词一般不包括那些“非法”移民。“非法”移民大都因起点资源和条件所限，进入美国便意味着进入社会底层。很多中国来的非法移民聚集在一些有中国城的街巷里弄，通过非法打工求生存。这些人跟美国国内大量的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法移民一样，大都干着美国社会中不能没人干、多数美国人又不愿意干的工作，基本上都处于隐形状态。只有在政客选举的宣传中，或有偶然的意外事故出现的情况下，才会被作为一种负面的存在而被媒体提及。这样的“旅美”人群，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中也基本处于隐形状态而不被提及。

但打工群体的界定，并不意味着在大学里从事高雅的学术就没有打工的嫌疑。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合法”旅美者大多是留学生。其中可根据出国前的经历分为若干代：知青或有“文革”经历的一代，八十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九十年代上大学的一代，独生子女新生代，等等。出国前的经历往往在这些人群身上打上一定的烙印，会在他们旅美的经历中显现出来，尽管并不一定会在出国后个人的生活和职业选择上而分道扬镳。在表面上，大多数人会在经过若干年的求学和求职后，最终在美国社会中找到生存的立足点，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必然会出现融入主流相对于批判主流的两难境况，而一个人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是否主流，也影响了她/他对中国民族国家发展的视角。旅美学人在安家落户后，开始考虑专业之外国计民生、经世治国之大问题。开始被这个社会的各类主要问题和意识形态倾向所吸引，最终形成不同的立场和倾向。从已存的美籍华裔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华人在价值观上，以及在对自己的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理解上的不同。

美国主流媒体的代表者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在内的报纸杂志。主流媒体的代表和他们的虔诚听众，往往以为自己对世界很了解，也总是以为自己对世界的了解是基于最正确的道德立场。如果“旅美”华人的立场被这些媒体所定的话，那么他们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可以说是属于主流精英中的“自由派”。如果不看那些精英主流的报刊，只看电视，那么他们的立场可能不够“自由派”，但仍属大众文化。耐人寻味的是，越是大众文化，往往越是保守，在思想影响的炒作上越是爱炒冷饭。大众和特权经常是同穿一条裤子。另外，也有很多旅美华人根本不关心英文的报纸杂志，信息来源只限于在美国出版的汉语报刊和网络。汉语报刊媒体大都仍然帮闲作美国梦，为主流媒体帮佣打工，比美国的主导阶层更玩命地压抑政治嗅觉和民主批判意识。主流媒体还经常警告美国梦的破产，或指出其漏洞百出，但中文媒体反而不厌其烦地渲染美国梦之完好无损，蒸蒸日上。

中国孩子考大学非哈佛、耶鲁莫属，中国的精英必是商界风云总裁，中国电影明星一定进军好莱坞，中国人的英语一定要字正腔圆，要不就遭孩子的耻笑，云云。简言之，绝大多数旅美华人都是在不同媒体的熏染下形成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这种立场往往会硬化、片面化，形成各类不同的“旅美”华人群体。只注意其中任何一类并且就此认为他们代表全部“旅美”华人，都是不全面的。

华人立场，以至多元文化的参差不齐，并不意味着各种文化族群趋向自由平等，可以互通有无、随意交流。等级和权势的金字塔从来就没有被表面的不同文化杂处震动过。近年来受美国“成功者获取一切”（winner takes all）的文化倾向的影响，国内媒体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身上，有钱有地位就是成功。对“旅美”华人评判成功与否的外加标准还有他们是否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被接受的就等同于成功。从陈香梅到赵小兰到“哈佛女孩”，似乎她们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就一定是中国人的骄傲，完全不清楚中国人进入主流背后的政治背景，及中国人的提升真正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在美国政界的提升，可能会有益于美籍华人，但这不会代表大陆中国人的利益。

本书作者也是旅美华人，但其身份的游移性、游击性，绝不愿作主流媒体——美国和中国的媒体——的应声虫。游击性能产生分析和批判力。这种游击性来自作者跨文化、跨国界的背景，来自对全球地缘政治、全球市场化及历史差异性的思考。比如，对美国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的反思，后面可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的经历和思想背景，可能是五四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可能是八十年代的启蒙和开放。游击性的理性思维，与媒体意象景观中的百花齐放、众说纷纭完全不同。游击学者即不是在美国也不是在中国的既定文明框架下运作，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心世界上的人们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中可以理喻、可相互通约的相同追求，而在相同的生存斗争中又创造出的不同历史，书写出不同的叙述。因此，在课堂上授业解惑之时，我们可以把文本放在历史的不同脉络之中。我们可以发现，俗称崇拜祖宗、侍奉家庭价值的中国人，在银幕上的形象比天马行空的西方人更追求放荡不羁的个人自由。反之，俗称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反而比任何“东方文化”更加强调中产阶级、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子孙满堂、早出晚归的天伦之乐。教学和研究因时因地，因政治、宗教和思想氛围，因全球和地缘政治大环境，便得出历史性的、因时而异的结论，从而解构了所谓中国、美国文化中的既定方针，挑战所谓亘古不变的先天特征。

在媒体霸权日益加强、日益市场化的今天，随着电子传媒技术飞速发展

与工具理性的二重唱，即兴“观看”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渠道。一个大财团垄断媒体的现代社会，往往缺少应有的历史感和足够清醒的自我意识。对这样的景观社会，应该由启蒙知识分子出面，向迷醉于景观的人群提出批评和警示。在美国社会里，这样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大学的校园里，尤其是在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里。进入美国大学人文和社科的少数“旅美”华人学者，也就有幸成为这类人群的一部分。我们穿越文化壁垒的游击战术，应该比一般美国学者更具历史和分析的深度。

主流媒体为不少旅美华人的个人成长小说提供了潜意识的动因，提供了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成功的准则。本文集有意对抗媒体的鼓噪对个人以及民族和群体成长小说的干预和垄断，表达出少数群体中一小部分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多年来身体力行而积累的，基于多学科的信息、概念、观点和立场，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形成自身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尽管每个作者又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观察和思考都是直接源于切身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他们教学经历中的所见、所思，希望给读者以启示，使得文化交流、中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触目惊心，从而以独立、批判的态度来编写自己的长大成人小说。

陈小眉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园(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陈小眉，比较文学博士，教授。1954 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1961～1967)、北京帅府园中学(1967～1969)、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1973～1977)、美国杨白翰大学英文系(1981～198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1984～1989)。1969 年至 1973 年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任兵团战士，1970 年"上调"到二师十四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报道员，采访、写作五十年代初期"支边北大荒"的"北京庄"、"天津庄"等老知青和新知青的人生路程。曾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1977～1981)，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比较研究系(1989～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园东亚语文系（在职，2003～　)。发表戏剧、文学、大众文化、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多篇。主要编著有：《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1995, 2002)、《当代中国舞台政治与角色扮演》(*Acting the Right Part*)、《西方的东方》(*East of West*，合编)、《当代中国话剧剧本选介》(*Reading the Right Texts*)、《当代中国视觉艺术》(*Visu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合编)。

又是红枫时节
——写在旅美教学十八年之后

1981 年枫叶红了的时候，我站在美国杨白翰大学的讲台上，第一次面对二十多名高鼻梁、白皮肤的美国学生讲授美国文学和英文写作。这在犹他州一时还成为小小的新闻！就像我的指导老师爱德华 (Edward Geary) 教授不止一次对他的同事们所说的：不能想象红色中国来的学生能讲这样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修改美国大学生的英文作文，能讲授对美国文学名著《红字》六种截然不同的阐释和与其相关的文学史。铁幕之内与世隔绝了那么多年，怎么会有人会讲英文，教英文？

其实，这里的苦涩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是自费留学的，不教书，就没有奖学金，就得打铺盖卷儿回家！于是，一个只学过四年英文的工农兵学员，仅有三年教中国学生英文经历的青年助教，不得不硬着头皮从头"恶补"美国文学史，还要研究英文写作的各种文体，以应付每周三天的讲课和改不完的

作文。

当时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还不多，周围的美国人都管我叫“红色共产党”(red commie)。开始我还以为他们不过是开开玩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他们称谓来自“红色中国”的人仅有的词汇，即便想“尊称”我，他们的语境中也根本没有相应的词汇！我不得不提醒他们：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国家不是红色的，是绿色的，有森林和牧场；是蓝色的，有蓝天和白云。

在冷战后期的美国校园，幽默可能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当然，我更多的是向他们讲起我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们。他们有的是 1949 年前后回国的留美留英学生(例如王佐良、许国璋等驰名全国的英语专家教授)，我熟识的邓炎昌教授甚至当过“美国大兵”(他曾是华裔美国公民，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愿放弃美国国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更多的是他们带出来的从未出过国门的一代中年教师。他们辛勤地教书育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文革”中入学的我们当然经历了特殊的英文教育，记得当年背得最熟练的是《北京周报》刊登的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文章的英译文。读书的内容有限，说不上丰富多彩，但是我们可敬可爱的老师们在特殊而又艰苦的条件下全力以赴，认真教学，其敬业精神成为站在美国讲坛上的我终身难忘的榜样。

我还会对美国友人讲起母校的“白求恩”夫妇——伊丽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和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他们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这对夫妇远没有白求恩大夫那样的名气，因为他们走上的不是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而是我的母校的讲台。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培养中国的英语人才工作了四十余年。尤其难忘的是，在“文革”的艰辛岁月中，在所谓“开门办学”、“下厂下乡”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英文教学；当我们因“文革”时期的风风雨雨对中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彷徨无措时，他们仍在大课讲演时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

以后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我常常感到美国学术界时髦的文化研究有时是隔靴搔痒，自相矛盾。一方面，一些学者常常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最新时髦，大谈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家问题上的西方霸权主义，试图为弱势群体找回他们失去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又轻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具体实践，仍然用二元对立的冷战式思维，用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若他们多少了解一些新中国为根本改变底层民众生存状况所做的种种尝试，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和少数民

族自治等等，也许就不会把中国的深刻变革简单地归结为“共产党专制”了。也许，他们还会把柯鲁克夫妇尊为一生实践“阶级平等学说”的先驱者——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柯鲁克夫妇就深入中国农村，实地考察土改，写下了学术著作《十里铺》。该书描写的中国穷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土改的空前热情不正和当下西方左派学术界追求的关注弱势群体的思维有着某种契合吗？与众不同的是，柯鲁克夫妇没有纸上谈兵，空谈理论，而是力图写出农民的经历和声音。这种着眼本土的，对中国民众的关注是至今某些在西方的非西方学者仍没有做到的。

刚刚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告诉我，大卫·柯鲁克于 2000 年 11 月 1 日逝世于北京，他把遗体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捐献遗体的外国人。他的儿子柯马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谦虚地说：“在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时，由白求恩的女朋友领着，我的父亲也到过白求恩家里。白求恩牺牲在中国的战场上，我的父亲是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因为行业、时代不同，我认为父亲的贡献不如白求恩。”[①] 而我却认为，炮火纷飞的战场固然有其悲壮和传奇的色彩，但几十年默默奉献于异国他乡却更需要毅力和宽容。因为没有毛泽东式的中国领袖为其树碑立传，柯鲁克的事迹也许永远不会被多数中国百姓所熟知；但在我心中，却有一座高耸圣洁的纪念碑。柯鲁克二十多岁时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1936 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文革”中坐了五年大牢，临终前，他只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认为应有某种标志，我很愿意在北外（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西院居住了四十余年的南楼东北边地势较高的花园内的一棵树上，或一个靠椅的靠背上钉上一个小纪念牌”[②]。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伊丽莎白那苗条美丽的身影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而过的情景。我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像她一样，讲一口地道的英语，走出中国国门，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结交五大洲的朋友，体验全新的人生经验。

有意思的是，七十年代我“敬而远之”的外籍教师[③]，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偶像”。二十多年来“在美国教中国”的经历中，鬼使神差，我竟然真的扮演了与柯鲁克夫妇“在中国教外国”相对应的角色。当然，与柯鲁克夫妇半个世纪前从西方来到穷困的中国不同，作为第一批自费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我是做着“美国梦”和“博士梦”走出贫困的国门，来到富裕的美国的。因此，“对应”不等于“平行”或“平等”。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关注伴随着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四年苦读。其间不乏对中国文化、文学、中西文化差异、不平等地位的苦苦思索。无论是在做博士论文时，还是在教授比较文学课程时，怎样用公正的立场和历史的眼光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我关注

的问题。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她的经济实力、政治力量远不如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学生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甚至像我们的前辈、同辈中国学者一样，致力于终身以讲中国故事为职业，是我多年来的诉求。

一

我对中国话语权和中国视点的重视，肇始于研究生时期接受的西方文艺理论的训练。1984 年开始，我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第一年系里规定了两门必修课：西方文学史和西方文艺理论史。赛义德 1978 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使我眼界大开。[④]这位来自巴勒斯坦的美籍学者从自己本土文化和非西方学者的立场出发，向西方学者阐释东方文化的话语立场及其历史观进行挑战。他认为西方学者在阐释东方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带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西方著作中的“东方”往往是西方景观，而不是东方图像。赛义德的重大贡献在于首次凸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敏锐地提醒人们要警惕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我虽然很欣赏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立场及其丰富的文化、历史、理论的内涵，但他所用的某些话语使我联想起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倡的反霸权思想：“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如果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风行，那么，六十年代毛泽东著名的反帝反霸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比今天时髦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更富有诗意，更具有“中国特色”。

以我所熟悉的戏剧史为例，资深剧作家陈白尘先生 1958 年创作的独幕讽刺喜剧《哎呀呀，美国小月亮》以文艺界参加全国大跃进的气势，在中国舞台上演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活报剧。剧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主题思想表达了冷战时期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反帝反殖的官方话语。[⑤]革命现代京剧《海港》中方海珍的著名唱段：“定使这上海港，紧连着江南塞北，莽原椰林，支援那国内建设，世界人民”[⑥]形象地表达了“文革”期间中国自诩为第三世界领袖的“雄心大志”。毛泽东的反霸权思想竟和西方后殖民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它却有效地推动了“文革”中的“继续革命”，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和课堂教学中，经常向学生讲述“文革”样板戏的艺术成就以及戏剧舞台和中国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学生们了解到当今西方文

化研究等热门理论及其相关的阶级、性别、种族、国家的论说几十年前早已在中国的舞台上付诸实践。[7]

从中国本土文化的立场出发，我在 1995 年出版的《西方主义》一书中，描述了当代中国的西方主义现象。[8]我认为不应把反帝反霸权话语“本质化（essentialize）”，认其为一成不变的“救东方出苦海”的仙丹妙药。五四以降，这种反霸权话语曾借助西方民主、科学的想象以完成中国自身的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它也被用来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误导中国民众。从“文革”初期的朦胧诗到现代派戏剧，当代文学中不乏借西方艺术形式及历史叙事来讲“中国故事”的反话语的（counter-discourse）事例。我提醒自己要在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中尽可能地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来讲自己关心的“中国故事”，并告诫自己：如果来自中国的学者，为了赶西方理论的时髦，“现身说法”地把中国文学史简单地归结成一部受西方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失语”的历史，那么，这不仅抹杀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与西方的对话和反抗的文学史、忘却了中国人自己的批判霸权的实践，而且还戏剧性地重复了毛泽东的反霸权思想，把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民众经过自己的实践摒弃掉了的思潮再次贴上“西方前卫理论”的标签，重新贩卖回中国，使后殖民理论成为具有“新殖民主义”特色的新霸权话语。不幸而言中，今天国内的“后学热”、“后殖民热”，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中国文坛上的重演。

弹指一挥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园已任教十八年。站在美国的讲台上，怎样才能既警惕东方主义的偏见，又防范西方主义的弊端，更要不断防范学术研究中的“二元化”倾向，以凸现跨文化、多边文化研究中多变、复杂、重叠、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不同层面？在我教授的“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小说”、“华裔文学”和“亚裔文学”等课上，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文本。[9]这里有东方古国发生的妻妾争风、男权至上的情节剧，有满汉风俗的戏剧冲突，有小脚妇人长途跋涉、照料革命子孙的苦情戏，有对革命的想象、参与、迷茫以致失望，有三代女人的儿女情长，悠悠挽歌。“国事，家事，天下事”熔于一炉，写尽了民国史、共和国史、文革史的风风雨雨。这是一个好教、“好卖”的中国故事。一部“女书”提供了一个好读的、好记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大事件年表。但是，它又是一个难教的故事：美国学生容易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很容易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故事：受尽苦难的中国妇女，只有在移民西方之后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讲不好，它也会成为一个具有“东方主义”意味的故事——即用西方人熟悉的二元化冷战思维方式把它理解为丑化中国的“反共”故事。难怪我的一个学生在课堂讨论时说，读了这本书，我再也不想去这个可怕的中国！可是，同样

是这个学生，几年后却从大陆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说她已在中国工作。她在俄大修的这门中国文学课使她从不平、好奇，到最终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她说我在课上讲的自己在中国成长的故事打动了她，使她更热切地要了解来自中国的不同故事，结识背景不同、经历各异的中国朋友。

的确，讲《鸿》这本书的第一步是要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使学生们对中国文化、历史感兴趣。然而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启发他们对文本叙事语言的批判立场（critical thinking）。我问学生们为什么《鸿》能在美国畅销，而其他类型的中国书却少有问津？一些好思索的学生有时可以很快地点到问题的关键："It made us feel good."（这本书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更有悟性较好的学生甚至提出本书的畅销可以提醒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东方主义思潮仍然垄断着某些西方读书市场。从多元文化的视点出发，我会进一步追问：如果《鸿》能使美国读者感觉良好，那么为什么它的日译本和中文繁体字本在日本、台湾等地也能畅销？有的学生会说，因为不同的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历史的认同会使人们对"他者"的历史文化感到兴趣，以便对自己的文化、社会进行反思。

二

十八年来，无论是教中国文学，或是中西比较文学，我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学生疲倦时，只要我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他们就会精神一振，睁大眼睛，专注地听讲。下课后，有些学生还会和我攀谈几句，感谢我的坦白和诚意（honesty and sincerity）。

我愿意现身说法讲自己的故事，是为了帮助学生尽可能地从中国的本土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以提醒他们每个中国人的故事都千差万别，不存在任何普遍性的"中国故事"（universal stories）。他们在读中国故事、看中国电影时，应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个中国故事会"叫座"？它迎合了读者和观众的哪种心理状态？常此下来，每接触到一个新的中国故事，就能使自己的中国知识积累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不是简单地收集有关中国的陈俗陋见（stereotypes）。比如说，观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挂》时，他们应该知道做爱前挂红灯、捏脚不是中国人的婚姻习俗，而是中国导演"东方主义"的包装炒作。

我常常讲到自己的童年。我想告诉美国学生的是：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涂抹上各种色彩的童年。我们不应以某个国家的"幸福"、"自由"为绝对标准。

我的童年就是很幸福的。从出生七个月到七岁，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幼儿园是我的“百草园”。每周虽然只有周末回家，但老师的爱抚，集体的友情，京都金色秋天的郊游，使我拥有一个健康的童年记忆。有的学生会说，这样没有父母呵护的童年怎能幸福，在我们这里，你的父母会被怀疑为忽略儿童罪（child neglect），怪不得人们常讲“共产共妻”呢。于是，我又要费些唇舌“忆苦思甜”，讲述中国妇女曾怎样摆脱旧式家庭的劳累，享受托儿所的社会福利，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以我的妈妈冀淑平的故事为例。1954 年，我刚刚出生不久，妈妈为将扮演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叶琳娜而兴奋不已，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有充分的时间做好角色分析的案头工作，妈妈把我送进了全托幼儿园。优越的社会福利使她能够摆脱四个子女的家务重负，像娜拉那样走出家庭，并于 1956 年在新中国的戏剧史上首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一角儿。而且，事实上她比娜拉更幸运：因为她不必回答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尖锐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经济生活和妇女权益的保障使她无须走出家庭而发现自己。当然，母亲也承认：能享有那样优越的托儿福利的人们是幸运的少数。但对比她 1949 年以前毫无保障的演艺生活，新中国的确为妇女——至少是部分妇女——提供了一个扮演自己性别角色的舞台。

母亲的舞台生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情趣和爱好，也促使我选择了终生从事中国话剧研究的学术之路。记得几年前应邀到母校印第安纳大学今西性学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 of Sexuality Studies）做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演讲时，听众们对我选放的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妇女识字扫盲、送子女入托的宣传画和幻灯片很感诧异：同时期的美国妇女——甚至是当今的美国社会低层的妇女——也会羡慕这种政府补贴的社会福利（我的女儿日托婴儿班的月费是九百美金，三岁幼儿班的月费是七百多美元。低收入家庭很难承受）！当然，我没有把新中国的妇女生活描绘为天堂。和任何社会一样，中国妇女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也经历了艰难与挫折。我会讲到这一点，但这不是我讲演的重点，因为我的有些听众早已在美国的传媒和畅销书中读到过不少有关“中国苦难妇女”的故事。我在讲台上会把重点放在常被“历史”遮掩的一面。

从小集体生活的经历，使我在十五岁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后，并没有过多留恋家庭和父母。[10] 关于知青的生活，我的学生已在张戎的《鸿》、明安琪的《红杜鹃》以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等书中读了不少[11]，无需我赘述。我并不否定这几部畅销书所揭示的某些历史真实性；但它们也不能代表全部的，甚至是“另类”的有益的知青体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我看到了农村的赤贫，体验到劳作的艰辛，开始要求自己从农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养